

活着的传统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高王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思想史丛书

活着的传统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高王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高王凌
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8

(思想史丛书)

ISBN 7-301-08396-3

I. 活… II. 高… III. 经济政策—研究—中国—清代 IV.
F1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9184 号

书 名: 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著作责任者: 高王凌 著

责任编辑: 谢茂松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396-3/K · 0353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东方人华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4.5 印张 22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再版序言

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是发生工业革命和进入新的物质文明的一个世纪。几千年来的文化观念,从此发生重大改变。似乎顿然有了一种“今是而昨非”的感觉,于是世界各国都有了“先进”和“落后”的区分,甚至谁若没有“现代化”,就要“被动挨打”,被摒除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像中国一类古老国家的历史文化,本来还是众所景仰,突然之间,竟变得一塌糊涂、不堪回首。

本书成文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即曾打算采用《活着的传统》作为书名(文库主事未能采纳),原有打破种种成见之意。对于过去的文化传统,持一个不带偏见的看法;即使是站在“现代”立场,也不认为二者之间有一不可逾越的障碍;甚而坚持中国文化传统原有其固有的价值,省得一说起中国历史,就是“封建”、“落后”,一大堆帽子四下翻飞。也算是自作主张“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一个结果。

“活着的传统”,意谓传统仍活生生地活在今天。是说古往今来许多东西,看似传统、老旧,却仍有其现代价值。现代原是从它走来,今日仍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这番话若在80年代讲出,不敢说是惊世骇俗,也颇觉不合众论。但在今天看来,却又似乎颇嫌不足。也许,三百年来我们就是乘坐在同一条船上,十八世纪,正是二十世纪的“先声”?而且,它也未必只有一个“工业化”的发展目标?……

说到这里,本书的立意,已与初版时有所不同,但仍不能说就有了什么最终答案。思念及此,更增加了“一代有一代之史”的感慨。历史恐怕就是这样写出,和不断修订的。要想当“历史的审判官”,说来,我们的“资格”都差着呢。

本书是不是把历史写得“太好了”,这也是对它的主要批评之一。如此,我倒可以举出一二例证。楼下邻居王姓老姐俩,早年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得过国际著名奖项(她们虽是学长,却非与我同一专业)。读了小书后说:没想到今天中国农业是这么走过来的,以前还没有看到这么清楚的说明。

2 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再一个是史学大家黄仁宇，他写信给我说：“我对费正清教授有许多不能同意的地方，但是他曾对我说起：‘把一个局部的问题研究得切实彻底，以后举一反三，对旁的问题就有独具只眼的看法了。’现在看你研究传统的重农政策，深有此感。”又说：“你认为中国历史有它自己的本位，不能平白付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 QUICK FIX（按：当即简便设计之意），应当使很多学者读着深思而受益。至于你引用拙著历史为何如是展开才是正途，提倡应该如是展开首先即将问题看错（按：即切忌不可作中国为何‘不能’或‘没有’什么之‘反向提问’），尤为铭感。”他一面对此书只能印得一千五百册感到不平，一方面又勉励说：“我的《明代 16 世纪的财政和税收》也只发行一千二百本，还是看书刊在出版界长久的影响吧！”

还有未曾谋面的学者评论小书：（所述）18 世纪“这些政治努力与陶澍、林则徐、魏源等的漕政与盐政改革相比，规模与重要性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或许，我们还需要进一步重构“18 世纪经世之学”，才能把许多事情说清，设若没有这些人和这些学问，“康乾盛世”又建立在什么之上？

反观十余年前，着手研究这些问题之时，固然是书写历史，另一方面，也倾注了笔者对当代问题的若干关注（这在当初曾颇受非议）。在初版前言中，我对这点并未讳言。如经济政策上的“多种经营”，（乡村）工业的发展，等等。就此也可以说，本书既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农村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也有若干地方，日后为杜润生回忆录引用。也无怪乎在密歇根大学讲演时，李侃如（LIEBERTHAL）、奥克森伯格（OKSENBERG）都感到了其间的相关关联。……不知后来学子还能否领略我的这番苦心，和这样对历史往复前后观察？

本书初版久已脱销，也不时有学子（包括相识和不相识的）向我打听。这次再版，多亏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王希，北京大学谢茂松的热情帮助，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原版前言

本书的主题，是传统时代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我选择这一题目来做研究，还是在十多年前，从学校刚毕业的时候，是为自己专业方向做出的一个选择，也可谓“胆大妄为”。问题是明摆在那里的，比如什么是传统的“经济发展”，该怎样去认识和评价它，这本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特别是，传统时代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政府政策”，首先就可以说是一个疑问，更不要说它有何意义了。在今天不少人看来，这恐怕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只配扔在“垃圾堆”里，不知还有什么研究和出版的价值？所以，如果这一选题自始即遭到若干不解和非议，那也是很自然的了。

那以后十余年间，我几乎没有离开这个选题。一开始是农业政策，继之是粮政问题，也从政府政策进入到政府行为。待到完成传统工业方面的考察，可以说已画了一个“圆”，似乎成了一个完整的东西，这也是自己始料所不及的。所以到1986—1987年访问美国期间，基本的轮廓已经有了。围绕着这些问题，也在一些地方（如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作过演讲，或见诸报章。回国以后，我开始着手全书的写作，即原有部分也都重作一遍。最后终于有了这本小书，其中也凝聚了笔者不少心血。

我开始选择这一题目时，可能只是“灵机一动”，但明眼人可以看出，它有着时代的影响，也与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这些都是无须讳言的。因此书中虽讲的是18世纪的中国，但它与20世纪的今天，彼此间仍有密切的关联，许多东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意义；或许，正是因为处身于这一时代，也有一些切身的感受，我们才可能重新认识这段历史和有关的文化传统？所以，这本小书既是一部历史著述，也可以说是为更多的关心当代问题的人而写的。

中国传统经济经过数千年的持续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中乃绝无仅有），到清代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展现出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水平。这一增长是怎样实现的？其主要成就是什么？清代政府为此曾提出什么

4 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对策和做出过什么努力？这些也许都是值得关心的问题，在研究上也存在许多空白，尽管它就发生在我们的“昨天”。

清史在中国历史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众所周知，传统的赋役制度是经清代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地丁合一”才得以完成的，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以及本书中讲到的许多问题，如果没有清史，也将会有很大的缺失，……因此也可以说，没有清史，中国历史就不“完全”。所以清史既是“传统”时代的一个代表，又与“现代”有着超出人们想像的密切关联，它在中国近几百年历史中实有承前启后的重大衔接作用。

按照过去的分期方法，这一段历史早已划归“古代”。从本书看来，这种说法就不无问题。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在18世纪的下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难道唯独中国的历史离今天就那么遥远、那么陈旧？为此本书力图表明，从三百年前直到现在，许多问题仍是“同一的”，努力是“一致的”，这整个阶段也许只是“一个历史”，它不应被人为地加以割裂。我们也断难把“昨天”一律斥为“传统”，把“今天”纯然释为“现代”。“今天”正是从“昨天”走出，并由“昨天”获得它的立足基础和生命源泉。从这种角度来看，不管在近几百年中，外来因素对中国历史发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却想更多地强调那些一贯的自身因素的作用，强调从中国历史出发的“正面观察”。如此说来，本书或许只是对中国的过去做一点“现代”的说明和对中国的当代努力做一点“传统”的诠释。它的最后一个却不是最不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对“中国学”的重建有所帮助。至少在若干基本的问题上，了解我们的先人都做过什么，他们是怎样思想和行动的，我们的行为是否或怎样“超越”了前人，这一切究竟又具有什么历史的和现代的价值？……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清代的农业发展政策，清人是怎样为着解决人口问题而提出了一套经济发展政策，它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实施和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政府政策问题是历史研究中一个比较新的领域。过去学者们曾研究过许多王朝初年多会有过的“垦荒政策”，本书旨在回答，传统政府在所谓“招徕垦荒”之外或“恢复时期”之后，对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还有无政策可言？如果说有，它是怎样的？或者我们可以倒过来问，经济发展及其政策问题，是否只是一个

“现代”问题,这中间的历史难道只是一种“断裂”?

在18世纪上叶,清政府全力在各省推行劝农政策,这直接带动了政府权力的扩张,各地也涌现出一批能员和循吏;乾隆初年更进而考虑土地制度的变更,更为全面地干预经济,特别是在粮食问题和粮政方面进行了一场巨大的试验。本书第二部分即围绕这些问题,进而探讨政府职权的扩张,以及当时人们对政府角色问题的想法和反省。这也是一段为国内外学者“忽略”了的历史,但它却是中国史中一次重要的“脉动”,并与20世纪的“大政府”现象直接有关。

第三部分转入“工业”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讨论,以对清代经济发展政策有一个完整的回顾。传统政府是否有过“工业政策”,这提法似乎也有些“匪夷所思”,其实已有学者指出清代政府在矿政上的作为,传统政府对农家手工业的提倡也是人所共知,与此有关的还有哪些方面?工业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会有或有着怎样的矛盾或冲突?我们又应如何认识那些潜在的问题?再者,如果说中国传统经济是一个“走到头”的经济,那么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们又该如何认识这一问题?……所有这些,在这一部分都要有所回答。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海内外同仁的许多鼓励和帮助。这里我想特别指出,每章篇首的引文,是出自我弟弟高小蒙的建议(他曾打算将这类具有现代价值的古代箴言用在一部讨论当代粮政的书中),许多数学方法的应用(如清初人口的前推等),也是在他的帮助下完成的;在美国的研究和访问,曾得到路斯(LUCE)基金会,以及福特(FORD)基金会的资助;本书的出版,则有赖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的支持。

目 录

再版序言.....	1
原版序言.....	3

第一部

人口问题和经济对策

第一章 人口问题的发现和经济对策的提出.....	1
1. 清初历史的阶段划分	2
2. 发现人口问题	4
3. 转移政策重心	8
4. 提出经济对策	16
第二章 劝农策的推行	26
1. 例证之一, 四川	26
2. 例证之二, 陕西	33
3. 推广多种经营	37
第三章 劝农策的成效和发展中的问题	49
1. 政策目标和经济成就	50
2. 例证之三, 广东等先进地区	57
3. 例证之四, 其他欠发展地区	60

第二部

粮政问题和政府干预

第四章 粮食生产政策和粮产的增加	66
1. 粮产增加的主要因素	66
2. 粮食供求形势和对粮产的强调	72

2 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第五章 政府职权的扩大	82
1. 加强地方行政	83
2. 劝农方面的政府作用	87
3. 限制部分生产经营	92
4. 讨论土地及租佃制度	95
第六章 粮政方面的新尝试	106
1. 乾隆初年的粮政变化	106
2. 乾隆十三年的大讨论	114
第七章 粮政得失和政府干预问题	128
1. 粮价上涨及其人为因素	129
2. 政府角色的重新反省	133
3. 农业政策的再评价	141

第三部

工业政策和经济前景

第八章 工业生产和有关政策	155
1. 推广农家手工业和解除矿禁	156
2. 清代工业发展和江南工业区	162
3. 传统经济思想及其局限	169
4. 政策上的潜在问题	176
第九章 清代中国的经济前景	192
1. 经济发展及其前景	192
2. 中国历史的正面贯通	198
3. 结语	206
参考文献和书目	211

第一部

人口问题和经济对策

第一章 人口问题的发现和经济对策的提出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语·子路》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可以食肉矣。

——《孟子·梁惠王》

五谷蕃植，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硇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

——《淮南子·主术》

清朝康熙四十年(公元 1701 年)，正当西元 18 世纪之初。在其后近百年时间里，中国内地几无兵革战乱，国家统一，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府库充裕，社会安宁，经济出现显著增长，故为旧日史家冠以“盛世”的美誉。

不仅如此，康熙朝取得的政治成就，在几十年间竟成为欧洲国家的

2 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楷模——其时欧洲正开始现代国家的建设,美洲各国纷纷准备独立——因此谁能说是旧时代的终结,还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局?其间新旧混杂,各种因素互相交织,也断难以“传统”、“现代”截然区分。

清代“康乾盛世”连同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是中国史上有数的几个辉煌时期。它们都不是处于皇朝创立的早期,而是在开国的若干年之后。尤其是清代“盛世”,所面对的已不再是招徕开垦等恢复性的工作,而是进一步的发展问题。这可能也是18世纪历史与当代中国有着切近关联的一个原因。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重新认识中国文化昔日的成就,以及一个传统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都做过和可能做些什么。

“恢复时期”和“发展时期”,是本书特别提出和加以区别的两个概念。在中国王朝更替的历史中,“恢复时期”比较多见(如汉初、唐初、明初、清初等等),它与其后的“发展时期”实有重大的区别。过去学人多只见及前者,对于后者的存在及与其相关的政策问题则不甚了了。因此提议研究有关的政府政策,也算是一项新的尝试。

公元18世纪之初,正是清代前后两个时期的分水岭。随着一个阶段的结束,新的问题涌现出来,但这一次,却遇到了中国历代都没有过的一个问题——人口问题。

在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人口问题多属于一种“近现代现象”(或“现代问题”)。但尚处于所谓“古代”的中国,^[1]却已直接面对了它,并进而受其“启发”提出了一系列人口对策——这就不能不受到我们的格外关注了。

1. 清初历史的阶段划分

在一本讨论18世纪小书的开端,也许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选择“18世纪”?

故事以18世纪之末作为结尾,也许易于理解,就在1790年代(乾隆的最后几年),中国内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民变和战乱(史称“白莲教起义”)——种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一旦暴露,历史上罕见的百年和平也就此结束^[2]——大约根据同样的道理,也有不少国外学者就此作出阶段划分,把19世纪(1800年)看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呢!^[3]

但为什么选择 18 世纪之初作为开头？这就要探讨一下“清初历史的阶段划分”问题了。^[4]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传统王朝，清朝建立于公元 1644 年（顺治元年），但明清之际的鼎革战争却经过了很长时间，直到康熙二十年代初（1682 年左右），随着三藩平定和台湾收复才告结束。这距清人人关已有四十年之久，如果把明末的那一段战乱考虑进来，时间就更长，影响就更大了。

还有另外的因素——例如“天灾”——也值得考虑。如同战事的年代要向前推，全球性的气温下降也不是始于 17 世纪中叶，而是更早。这一次气温下降不仅给中国，也给欧亚大陆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影响。其危害恐怕也不是传统政府——比如明代，或换作任何一个朝代——所能抵御得了的。万幸的是，到康熙二十年代初期气温终于回升。因此许多学者都赞成以 1680 年代（如 1682 年）划界，或以为所谓“熙朝盛世”就是始于康熙二十年代了。

这样，我们就要面临如下一些史料的评价和认识问题。

时人魏际瑞在康熙十年左右的一篇文章中说：

窃见顺治初年以至于今，将三十年，古人所谓一世者也，……而百姓如此之穷，国家常董不足之虞，自顺治十八年以后，至今日而甚者。

河道总督靳辅于康熙十八年上疏说：

臣屡闻江浙士民之言，……近来各物价值颇贱而买者反少，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大非二十年前可比。……民生穷困，至于此极。

这种现象也已及于偏远地区，如顾炎武所说山陕一带：

今来关中，……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相率卖其妻子。……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5]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种现象到康熙二十年代后并未终止，如唐甄所说：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困穷，……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中产之家，尝旬日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饿，百货皆死，丰年如凶。

4 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据今人研究,这一由“通货短缺”导致的“经济萧条”,正是因为实行“海禁”,海外白银无法进口而引起的。^[6]它始于顺治末年,一直持续到康熙三十年代中叶(即唐甄所说“清兴五十余年矣”),即1690年代末期,随着开禁政策的生效,才告结束,这岂不是战乱、天灾之外,影响着清初历史阶段划分的又一个重大因素?

这样我们就可将明末清初以来的历史作出如下的阶段划分:

清初历史的阶段划分

明末	1644年	1660年	1683年	1700年
天灾.....				
战乱.....				
经济萧条.....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清代17世纪下叶作为“恢复时期”,而把18世纪作为清代的“和平建设阶段”,或所谓“发展时期”。^[7]

但这又不免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如国外白银的输入,当时中国经济的性质、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至世界“现代史”的进程,等等,都很值得注意。^[8]

2. 发现人口问题

如果我们提出,在这个时候——大约康熙四十年代——清政府就发现了人口问题,^[9]就不免会遇到一系列的质疑。

首先须回答的是,根据什么说清圣祖皇帝(年号康熙)发现了人口问题?^[10]

故事也许还要从头说起。圣祖曾追述说:朕自十四龄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之宫中柱上。^[11]康熙二十年代,当三藩平定,便逐步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经济事务上来。摆在首位的自然是畿辅及东南诸省的“经济重心地区”,^[12]及与之相关的河务和漕运等问题。为此他曾多次出京巡省,表现出对“民生”的特别关切,并终于产生了对人口问题的一些看法:

(三十八年谕)苏州民既庶矣,看来是庶而未富。^[13]

(四十二年谕)“观今日南方风景,民间生殖较之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似觉丰裕”;“四海莫安,民生富庶。”^[14]

不但江、浙人口最为繁庶,据报福建亦人口甚多,较往年繁息数倍,谕:

福建民多田少”;“必令各得其所始善。”^[15]

类似现象在北方也可见及:

今巡行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而该抚并未尝奏称彼处纳粮人少者,……于此可以知小民生息之繁矣。^[16]

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17]

人口的日益增加,也影响到物价等,显现出与经济萧条时期大不相同的景象:

米价终未贱者,皆生齿日繁,閒人亦多之故耳。^[18]

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地少故耳。^[19]

终于感觉到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压力,和人地比例的失调。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谕:

南方地亩见有定数,而户口渐增,偶遇歉岁,艰食可虞。^[20]

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便鲜明地提出了人口问题的存在:

承平日久,生齿既繁,纵当大获之岁,犹虞民食不充。^[21]

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不可不为筹之也。^[22]

四十九年(1710年)又谕:

比来省方时迈已历七省,南北人民风俗及日用生计靡不周知,

而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朕洞瞩此隐，时深轸念。^[23]

将人口日增认做民生贫困的一大原因；五十一年遂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谕，减轻丁赋负担。也正是由于“太平日久，人口滋生多至数倍”，因此圣祖“平素间谆谆以此事面谕众大臣”；并终于提出，“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24]

站在今天的观点，或从某种“科学”论点出发，可能会有人指责圣祖的认识缺乏可靠的数据史料支持。如果我们在此做一简捷笼统的回答，那就是传统中国并没有这样一套史料，可以简便地被今人当作“统计资料”使用；古人对这一类问题的观念，更与今天有着相当距离。但具体说来，有些问题还不能这样一笔带过。

比如说，清代初期并不是只有人丁编审，而全无人口统计，如在“朝觐须知册”中即载有各地上报朝廷的人口数字，但由于它保留下来的很少，^[25]所以人们通常只能依赖人丁编审数字。人丁编审是为征税所用，其对象并非全部人口（字面上规定是16—60岁的男子），各种遗漏或不合理之处一定很多，明代中后期以来又摊入了许多地亩税的成分。因此反映在统计结果上，不但明代长时期是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约5000万人至6000万人之间），对清代而言，时人也觉颇不可信。如顺治十八年编审直省人丁2106万有奇，至康熙五十年不过2462万有奇，清人王庆云说，尝疑“圣祖深仁厚泽，休养五十年间”，人口增加何以仅有十分之二？待读过康熙五十一年谕旨，才明白其中道理。^[26]谕曰：

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27]

可见圣祖是了解人丁统计的不可靠和各地人口的实际情况的。其主要的途径，并不是依靠什么数字统计，而是通过上述在各地的巡省。

不过，据今人测算，当时中国的人口数量并不太多。如据早先的权威估计，1700年中国人口约有1.5亿左右，相当于恢复到明代的最高数值；^[28]晚近些的估计，则仅有一亿左右，尚不及明代最高时期之多。^[29]从总量上说，这些都不是很高的数值，何以清人会有较前人更深

的感受?

回到故事现场,这一问题可能就不难于理解。康熙一朝巡省的主要地区,就是从畿辅沿运河至山东、江苏、浙江,中国东部运河沿线诸省。这一地区正是明代以来的经济和财税的重心区域(即所谓“基本经济区”),人口比较稠密;而从明末以来的历次战乱中,所受破坏程度较低(如山东等),特别是未受到三藩之乱的直接骚扰,有较长时间的和平休养,又经政府集中财力修河治水(“河务”及“东南水利”),所以到十七八世纪之交,就显现出相当的繁庶景象。这样,不管当时全国情况如何,从圣祖的经验来看,都会得出“生齿日繁”的结论。^[30]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人口数量之外,也看到当时人口的增加速度——这是时人可以直接感受得到的^[31]——对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

清廷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这就是对八旗生计的关心。早在三藩平定不久,朝廷有见于(盛京)“旗民日增,较前稠密”;八旗兵丁“子孙繁衍,无田房者甚多”;“户口日增,费用益广”,几次为其代还债务,动支帑银五六百万。其后亦曾不断补救。^[32]旗人生计虽有别于一般民众生活,却给清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有助于认识整体性的人口问题。

大约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圣祖皇帝发现和指出了人口问题的存在。对于这些问题,也许会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康熙时哪里会有这么“严重的”、“真正的”人口问题?我想,对于历史问题,首先是要认清它的存在与否,然后才是其他。一个事件的发生,并不取决于它的“对”、“错”,如果我们完全按今天的认识和逻辑去理解古人,那么历史中恐怕就会充满了“错误”和“不合逻辑”,历史也就不再成其为“历史”。

圣祖的人口思想在中国人口思想史里具有何种地位?按照过去学界的流行看法,清代最早发现人口问题的,是乾隆末年的一位文人洪亮吉,因与西方人马尔萨斯同时,故被视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但与圣祖相比,后者已晚了九十余年,二人地位也有很大差别。特别重要的是,二者的人口思想,在字面上并无多大出入,^[33]其间存在的,可能更多的是18世纪初叶与末叶社会情况的差异,以及在含义和实际效果上的不同。而且,对于人口问题,洪亮吉也主张从发展经济予以解决,这点与圣祖并无二致。这或许正代表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与之不同的、